永远的怀念

——忆田贲同志

王丹群

1934年，田贲(即花喜露——编者注)同志从海城三师毕业后，到盖县归州村两级小学任教。他知道在日伪统治时期，当一名教师，不仅要教给学生文化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要启发他们热爱祖国、不当亡国奴，做一个振兴中华的中国人。但在当时，尤其是在已沦陷为殖民地的东北，这些思想又不能直接给学生说，田贲同志就利用历史课和业余时间给学生讲文天祥、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，来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，要立志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。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当时写的《校歌》和《朝会歌》上。可惜校歌的词现已记不起来了，但朝会歌当时天天唱，至今记忆犹新：

“朝霞灿烂，一朵太阳红，光华雄浑照碧空，霁色锁川原，川原形势雄，龙蟠虎踞无终穷。请看我山河，山河真光宠；请问我责任，责任真綦重。用我好身手，趁此晨光熊，砥砺磨砻，使我精力充，他日破浪趁长风，宇宙任驰骋。好友好友莫等闲，一刻千金重。”

这首歌象熊熊的火炬，引导学生积极向上，热爱祖国的大好山河；像一把钥匙，打开学生的心灵，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。今天读来，仍有奋发图强、振兴中华的鼓舞力量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田贲同志对同学情同手足，严格要求，一丝不苟。有一次田贲同志给学生出作文题《论志》，文章改完，在全班会上他对好的立论正确的文章给予鼓励，并对错的指出方向。如有一个同学在文章中说他立志学好，将来好享受荣华富贵。田贲在文后批“富贵之志不足取”，他找这个同学谈心，鼓励他志向要远大，念书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家……使这个同学深受教育，以后他参加了田贲组织的鲁迅文学研究社，成为一名爱国青年，“九三”胜利后参加了革命。

1936年，田贲在归州学校组织“鲁迅文学研究社”，和爱好文艺的学生共同研习左翼文学。当时为他所喜爱的几个学生都起了笔名，记得有赤婴（已故）、殷拳（已故）、立绯、田丹等。赤、殷、绯、丹都是他所喜爱的红色。

1937年，我离开归州两级小学，考进了初中。这时田贲除了和我们离开学校的同学保持联系外，并和他所团结的一些青年作者在归州秘密油印地下普罗文学刊物《行行》、《星火》。他经常给我写信，要我写稿，寄给我鲁迅、巴金、郭沫若、丁玲等作家的著作；还有外国名著：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钦差大臣》、《娜拉》、《死魂灵》、《母亲》等，这些书开阔了我的眼界。

1937年冬，田贲写信告诉我：我们要组织起来，用文学启迪人们的心灵，教育人们去战斗。开始我们的力量很小，就象一点火花，但是它可以越来越大，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嘛。我们一个人燃起一把火，它会照亮一角，我们四亿五千万人每人燃起一把火，就会照亮整个中国，我们的组织叫“星火同人”吧。这是一个抗日救国的秘密组织，到1939年底已发展30余人，主要是青少年。那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

是我们青年最好的老师、朋友、战友。他不但能给我们广泛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讲革命道理，是我们革命的领路人。当时大家都愿找他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，他都能给你解答得那样明确，而又引导你去深思。所以那时不管跟他念过书的，或是没跟他念过书的，只要见到他都叫他“花老师”，“花老师”是大家对他的尊称。田贲在归州教书5年，因他没有阿谀奉承的媚骨，而被排挤离开归州。

1939年底到1941年冬，田贲在镶黄旗小学和熊岳一小任教。时间虽短，他却团结了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如那里的郎老师、戚老师，还有姜琮璐、琮琏、存光等同志。

在这期间，为了扩大宣传，1940年初，《星火》在《营口新报》文艺副刊上公开发行了。田贲同志亲自为《星火》副刊写了发刊词，严肃申明：“《星火》是为人们开花的，不是为任何人插花的。期望读者不止于知识层，且应有农夫、樵夫、老妇和壮汉。”这是在辽南文坛树立了一棵左翼奇葩。是年冬，由于该报主编发现《星火》副刊内容左倾，便威胁说：“反满抗日可以，但宣传赤化不行。”以后《星火》被迫停刊。田贲同志在停刊前两期《星火》副刊上发表了杂文《吃气息》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但该报主编顽固到底，最终关系破裂，田贲只好在《星火》副刊最后一期上发表了杂文《舒愤懑》痛斥了反动势力。《星火》副刊共出版20余期。《星火》虽然是短暂的，但她却在辽南的青年中播下了革命火种。

这一时期，田贲同志在《星火》副刊上发表了小说《幽静的山谷》，在《地平线》上发表了长诗《孙二祖宗上西天》等作品。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反映了当时辽南地区农民对帝

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。田贲同志的小说、诗歌、杂文、议论文等，都以其独特的战斗风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

1941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在家乡那四处飘香的田野上走着，谈着。满枝的苹果，火红的高粱，金黄的谷穗……多么迷人的秋色，这一切是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，这是我们父老乡亲血汗浇灌的成果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可那一道道铁丝网，却使我们不能越雷池，这一切又使我们感到那么生疏，那么仇恨。田贲说："看看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的国家，已变成了异邦。难道我们等待吗？不、不能！洋人除了侵略我们的国土，屠杀我们的同胞，还要奴化我们的思想。学校派来了日本人，我要到最艰苦的斗争中去……"以后田贲写了《故乡、异邦》的诗，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。就在这年冬天，田贲给学生上了《最后一课》，这一课的深远意义，当时的学生是不知道的。

1941年冬，田贲来到沈阳参加了革命，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正途。

到沈阳后，田贲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。住在大南街一段高家大院门洞的"五步室"（大小五步平方故自名五步室），冬天冷如冰，夏天热如炉，吃的是煮不烂的高粱米，有时还要饥一顿、饱一顿，每天要徒步上班。就在这样的陋室里，他除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外，还以山川草草的笔名，在《盛京时报》文学版上，发表了《向何处去》、《日本开拓文学的翻译》、《大众语与文艺》、《应声之语》、《塔·城·一切建筑》、《诗歌的发生》、《观剧书感》、《期待于今年者》等文学评论和理论文章。这些作品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东北沦陷

区文学的方向，既显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，又以高度的写作技巧避开了敌伪的审查。

为了充实自己，以利战斗，他不知疲倦地看书学习。看马列主义书，文学书，还学日语。时间是紧张的，舍不得浪费掉一分钟。有时为了看一本书忘掉了吃饭，等想起吃饭时一看炉子熄了，米还是半生的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也就吃这半生饭，他还幽默地说："我是吃生米长大的。"

1943年夏，经组织批准，我和田贲在沈阳结婚了。婚后，我们仍住在"五步室"。那时我们的生活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：住的"五步室"，吃的"自由饼"（把黑面用白水一和烙成饼），喝的"解放汤"（白水煮菜），读的马列书，做的革命事，真是乐在其中。

就是在这个"五步室"里，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欢乐忙碌的日日夜夜。这个小小的"五步室"是传播革命真理的课堂，是研究革命斗争的密室。那时，侯洛和贾玉岗同志常来这里和田贲密谈革命工作。有数不清的青年来这里聆听田贲讲革命道理。在日伪统治的黑暗岁月里，对寻求真理的青年来说，如同黑夜里看见了指路的明灯，周立、王清等同志就是从这里奔赴解放区参加了抗日斗争。

田贲对我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，布置给我的工作很多。除了一日做两餐简单饭菜，我还要写日记，抄马列主义书（如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大众哲学》等）。每天晚上他要检查一下，我每看完一本书都要谈心得体会，有时还要写出读后感。他常对我说："我们是为斗争而生，我做的事不是为个人，而是为劳苦大众，和我共同生活不是幸福，要有不怕艰难困苦，甚至牺牲自己的胆量，你怕吗？"我说："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怕，你做什么，我做什么；你怎么做，我怎么学，你做到的，我也要努力做到。”他高兴地说：“我相信。”

星期假日我们常到顺城街的旧书摊去，搜索在书店里不能买到而又极其宝贵的好书。如倍倍尔的《妇女与社会主义》就是在旧书摊买到的。他还领我和来找他的青年去看贫民窟、工夫市（失业者出卖劳动力的市场），观察饥寒交迫的贫民生活，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，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。

在艰险的革命斗争中，田赍的机警性是很高的，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。在抄革命理论书籍时，都是首先把书拆成单页，有外人来，我们就把它当废纸轻轻一揉，假装扔掉，来往信件看完后立即毁掉，在日记和书信中不写任何人的名字。

1943年冬，我们离开了“五步室”，搬到小东街一段九十四号。但“五步室”我们没有舍得辞掉，由姜毅同志继续住下去，直到田赍被捕，姜毅同志离开沈阳到胶东解放区工作，这个“五步室”才人去室空。

1944年4日28日，田赍不幸被日寇逮捕，关在北陵留置场的一间刚能转开身的暗室里。夏天热得喘过不气来，冬天冻得发抖。敌人为了得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党员名单，对田赍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，吊大挂、过电、灌辣椒水，压杠子、皮鞭抽……。田赍在北陵留置场受审讯历时7个月之久，每次审讯都是晚7点到次日早7点，从没间断过。在审讯时田赍以不可遏止的愤怒，用大量事实控诉日寇侵略中国犯下的血腥罪行，一件件铁的事实驳得敌人理屈词穷，所以每次敌人都是一无所得，只有施以酷刑。有一次敌人问田赍的朋友都是谁，田赍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还用问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中国人都是我的朋友！”还有一次敌人看硬的不

行，就施软计。审讯的日本特务说："每天审讯你够累的了，吃个苹果吧。"田贲一见苹果就怒火满腔，立即拿起苹果向敌人摔去："这是我家乡的苹果，用不着你给！"于是敌人就用鞭子抽得他全身是伤，看不见一块皮肤本色。敌人狂叫："这就是艺术"。在7个月的审讯过程中，田贲受刑昏死过11次，出狱后背上还留着两块伤痕。

田贲在敌人面前，坚贞不屈，以钢铁般的革命意志，和不可摧毁的共产主义信仰，战胜了敌人的酷刑，做到了"到我为止"的誓言，以自己的血肉保卫了地下党组织和与他联系的同志及朋友。正如他狱中诗作之一所写："慷慨赴囚虏，挺身担大刑，愿将新血肉，烈烈试贞情。"真是大义凛然，正气冲天！

田贲在狱中，写了大量狱中诗，有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《谁也不知道》、《暗室颂》；有浩气冲霄的《颂梅》、《无题》和狱中歌《我是王》。这些诗有的是田贲从狱中写给我的，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力量啊。敌人只能摧毁他的皮肉，却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和信仰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，田贲同志胜利地走出了监狱。由于敌人的酷刑、饥寒迫害所致疾病已经十分严重，面肿腹胀，使他卧床不起。出狱第三天，侯洛、贾玉岗即来看望，当即决定住院治疗，经确诊为结核性腹膜炎已到后期。每天午后发高烧，但一当烧退他就看书、写文章、作画，有时给我讲狱中的斗争。他说："我很坦然，我没在敌人酷刑下低头，严刑毁坏了我的肉体，也坚强了我的意志……。"是的，田贲不但在敌人法庭上是个强者，在和疾病作斗争中也是一个强者，没因病痛哼过一声。

1945年底，田贲出院了。病情在继续恶化，经济也到了绝路。为了解决经济的困境，我们在朋友的帮助下成立个“成衣局”。田贲说：“闻鸡起舞，就叫鸡鸣成衣局吧”。这个“鸡鸣成衣局”，牌子不小，可是“掌柜的”、伙计都是我一个人。我每天除了要为田贲买药、打针，还要照顾孩子、做饭，哪有时间去做针线，只有晚上机器的轧轧声唱到天明。

田贲的病痛，生活的困难，坎坷的路程，使我的心情有些伤感，笔调自然低沉。一天，田贲看完我的日记，深情地对我说：“不要把生活写成一把泪，生活就是斗争。革命道路是曲折的，没有笔直的坦途。磨难和困难是强者的熔炉，不能被它吓倒。”又让我读了一首他在狱中寄给我的诗：东方有顽铁，投炉而锤炼，一朝双刃成，凭君惊绝艳。他对我说：“是啊，千锤百炼才能成好钢，只有那些伪货，才经不起熊火烧炼，最后成为渣滓而被扔掉。斗争还远没结束，我们要继续战斗。”

田贲同志在病床上仍未放下他战斗的笔，他写出了《到前面去》、《不，不要放下武器》、《他们的钱是谁的》、《你们的和我们的》、《人民是正直的》、《人·盗匪·野兽》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的战斗诗篇。

1946年春，我军撤离沈阳，田贲因病无法随行，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护理田贲继续治疗。他坐不起来就躺着写字，画梅花，直到病危时还读完了毛主席的《论联合政府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

1946年6月13日，田贲同志与世长辞了。但他的床头仍放着未写完的诗稿《蛹的情绪》和没画完的梅花。同志、战

友，你去了！你是不甘心去的，因为你说："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，我不能走。我对革命的贡献太少了，我不该走。"是的，你壮志未酬，你不该走！你没有走！你把精神留给了我们。

安息吧！我亲爱的同志和战友。

作者简介：王丹群 女，笔名田丹，花喜露的爱人。辽宁省瓦房店市人。1922年生。1943年参加革命，盖县"星火社"同人。中共党员，辽宁中医学院人事处副处级离休干部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的爸爸花喜露

花友藩

我的爸爸花喜露（田贲）逝世已经45年了。虽然时隔较长，但是他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，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比坚定和疾恶如仇、刚直不阿的品格，勤奋学习、追求真理的精神，努力工作、克服困难的毅力，还时时鼓舞着我。

爸爸小时候就喜爱书画，学习成绩突出，深得爷爷、奶奶以及他的启蒙老师的喜爱。爷爷从他无文化的痛苦中，深知念书的重要，因此，不惜卖地也供爸爸念书。这样，爸爸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（奉天省第一高中）。因为家境日渐贫困，他只念了一年高中就转入奉天省立第三师范学校（在海城）。因为这个学校免收伙食费，家里还免强供得起。他于1934年毕业，被分配在盖县归州两级小学任教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。

爸爸在学生时代勤奋好学，孜孜不倦，学习成绩一直优秀。后来又得到其伯父花济川（清末秀才）的指导，能写出一手好隶书，他还喜爱画画和篆刻。有一个小本子是他初中用的，里面记了好多东西，有《诗》、《遂意》、《趣》、《常识》等部分。在《诗》中有“东方叠云似泰山，青紫红蓝尽缓缓。一朵晓云捧晓日，万重山上万重山。”还有“谁云一日不三秋，放假来归总埋头。睡起日长无别事，荷花遥寄一心幽。”等共计五首诗。在《趣》中有几个小故事。在

《常识》中记有怎样种菜、怎样接树、种葫芦、搭棚等等知识。

爸爸虽然在沈阳只念一年书，但对他这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，确实是见到了“大世界”。当时正是张学良时代，打倒列强，抵制日货的反帝浪潮日渐高涨。他们经常唱着“日本小鬼真真完，夺我旅顺大连湾……”和“打倒列强”等反帝歌曲，在他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。在沈阳的大书店里，什么书都有，他简直是走到了知识的世界。他爱书如命，从沈阳回来时，除了路费之外，所有的钱都用在买书上了，装得满满一大箱子和一柳条包。他在三师那段时间里，就专攻文学了。他对鲁迅的作品爱不释手，只要听说谁有鲁迅的著作，他总是想法借来读。因为他的文学好，他负责出校刊和管理图书，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更多的书了。他从这些书中吸取了文学知识，了解了中国和外国，了解了过去和现在。尤其是当时的一些进步书刊，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

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这风云突变的政局，震动了全国，震动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。三师这时候被迫停课了，爸爸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中。复课无望，村里的人就叫他教村里的孩子念书。他白天教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之类，晚上就看书写文章。他从学校走向社会，开阔了眼界，了解了民情。有一次奶奶到熊岳城里去，回来看见一群日本妇女在大路上站成一横排，叽叽喳喳又说又笑十分得意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回到家中，奶奶一边落泪一边叙说：“咱中国的地方，为什么让他们给占了？”爸爸在一边坚定地说：“将来一定把他们撵出去！”

日寇铁蹄践踏我国的大好河山，权势当道，腐朽黑暗的社会，中国将怎么办？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摆在他的面前。在他写给小时候的朋友赵振立的信中有五绝一首，可看出他无限忧国忧民的情怀："教童三字曲，徒念一文谣。家贫不需虑，国恨何日消？"社会实践的教育，使他更加醒悟了。他骂那些反动文人是"穷人的祸害，富人的走狗"，他再不写字画了，他说："那是给人（指富人）看的。"他关心国家和人民，自己不讲究吃穿。他已经把自己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返回学校继续读书。他办的校刊就更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，因此那个校刊就形成了两派：抨击时弊、反满抗日派和汉奸投降派。那是中国政治势力之争在小小校园内的反映。

1934年，他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他先后在盖县归州、康宁堡、熊岳城等地任教。他把阶级仇、民族恨化为对学生的无比关怀、热爱；他把为国为民的宏图大志和现实工作完整地忠实地结合起来了。他把学生看成是抗日救国的后备军，看作是祖国的希望。他从来不打骂学生，还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买书买本，关怀备至，常高兴地称他们为孩子。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，学生非常爱学。在归州两级小学有不少学生住宿，爸爸晚上就给他们辅导，家在附近的同学，晚上也经常来。他从来不讲课本上有关"日满亲善"、"大东亚共荣圈"之类的课文。而讲他自己编选、自己刻印的有进步性的"补充教材"，如《伐檀》、《硕鼠》、《黍离》等。他办墙报《春潮》、校刊《飞浪》；办图书阅览室、读书会。他经常给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，

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，讲“二十一条”卖国条约等。他形象地把辽东半岛比作母亲的乳头，“母亲的乳头被割掉了她该多痛啊！”听课的学生失声痛哭。爸爸强烈的爱国热情感染着学生们。有个学生在赛诗会上激昂地朗诵他的诗：“南国春光北国秋，春草淡吐懒牧牛。暖风吹得全民醉，直把中华作满洲！”会后爸爸对这个学生说：“诗词如剑应入鞘，文学似刀刃还薄。”意思是说政治锋芒太明显，要担风险，二是说有的诗句还欠妥，要加强磨炼。爸爸还自编教材给学生讲。如“冬天的尾巴还在颤抖，春天就要来了。春天，可爱的春天，你来，你快来呀，我正在等候着你。你有红的花开，你有绿的草长，鸟语花香，你会迷住这整个世界。”在康宁堡小学，有一次正课讲完之后，他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了两行大字“在人身上榨取生活的是蟊贼，在土地上榨取生活的是英雄。”一言不语，微笑着环视课堂。他把《大路歌》作校歌，把《摇船歌》作班歌，以激励学生奋进。爸爸雄厚的文学知识，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强烈的爱国热忱，生活俭朴平易近人的和蔼作风，给学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学生戚汉翼不去经商，认为那是“在人身上榨取生活”而愿意在家种地。他的得力学生刘永良十四五岁就能作诗，写小说。他在熊岳城小学教过很短时间的学生王孝先，甚至仅仅给代过几堂课的学生赵庆忱，一提起爸爸无不感慨万分，印象之深终生难忘。在爸爸的影响下，有的学生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，有的学生加入了革命行列。

爸爸满腔的爱国热忱，对敌伪疾恶如仇的变革决心，使得学校的天地显得太小了。他“以文会友，”在盖县地区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，他们秘密地出版地下刊物《行行》，说

古论今，抨击时弊，抒发爱国情怀。他们成立了“鲁迅文学研究社”。爸爸对鲁迅著作最爱，鲁迅对他的影响也最深。他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，曾经用泥塑了鲁迅的头像，以表崇敬哀悼之情。有的老师说他是“鲁迅的忠实信徒。”他曾以灵莎、山川草草、黑田贲夫、王瞻等笔名在《营口新报》、《地平线》等报刊上发表诗文，长诗《孙二祖宗上西天》、小说《幽静的山谷》是他的代表作。作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卖国贼的罪行。

1941年，他离开熊岳到沈阳，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。他身居蜗室，生活十分清苦。但是他得到了阳光，充满了无穷的力量。他忠实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。1944年不幸被捕入狱，在狱中，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，虽然遭到了严刑拷打，但是他坚贞不屈，保全了组织保全了同志。狱中的酷刑折磨，使他患得多种严重疾病。1945年“八·一五”光复，爸爸兴高彩烈地出了狱，他简直忘记了身染重病，出狱就向组织提出查封监狱的审讯记录，又紧张地开始了他的新的战斗……。但无情的病魔，向他步步逼近，党组织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，作了最大的努力予以治疗，但他终因病情过重，医治无效，于1945年6月13日与世长辞了，年仅34岁。

爸爸在狱中写下大量诗稿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，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。这些诗稿，经过艰难曲折，辗转保存至今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我们的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。经爸爸生前的领导、同志及朋友们的共同努力，政府有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。现在辽宁省政府已经批准追认我的爸爸花喜露为烈士。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曾经为她抛头颅洒热血的忠实儿女。

爸爸参加革命时，我的年岁还小，那时爸爸给我、弟弟、妹妹分别起了个带“铁”字的名字：“铁骏”、“铁汉”、“铁虹”。爷爷由于家族观念，让我叫“友藩”。今天我领悟了“铁”字的真谛，“铁”字包涵了爸爸对我的全部的爱和全部的要求与期望。我一定不辜负爸爸的希望，要象爸爸那样作人，象爸爸那样工作、战斗。将我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党的事业上，继承先辈遗志，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作者简介：花友藩　笔名铁骏，革命烈士花喜露的长子。辽宁省盖县人，1938年生。辽宁大学物理系毕业，中共党员。现为盖县熊岳高中教师。

在与花喜露相处的日子里

郭世魁

好友花喜露逝世已45年了。回忆起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，其音容笑貌，犹在目前。

我和花喜露两次同学：第一次在初中（1928——1930）分在同学年的两个班；第二次在省三师（1933——1934），他比我早一届。他在师范学校时，爱文艺、管图书、办校刊，我也常投稿，因此很熟。毕业后，我们先后分配到归州两级小学任教。

归州两级小学的校舍，是利用归州村后一个平顶小山南坡的庙院扩建而成。有东西两个校门，门上都有对联，白地黑字，都是花喜露编写的，隶书。东门长年关闭，故已忘记；西门天天走，记忆犹新：

高本自卑，知勤求方能进步

级防躐等，唯循序乃可图功

很明显，这副对联是采用鹤顶（“高、级”）的手法编写的，勉励同学们学习要勤奋，要有毅力，要持之以恒。

我俩曾共同编写《朝会歌》（每天朝会时唱）和《校歌》，他作词，我作曲。至今朝会歌曲还记得，词已大半忘记，幸经焦德濂同学帮助补记上了。现抄录如下：

朝霞灿烂，一朵太阳红，光华雄浑照碧空。霁色锁川原，

川原形势雄，龙蟠虎踞无终穷。请看我山河，山河真光宠，请问我责任，责任真綦重。用我好身手，趁此晨光熊，砥砺磨砻，使我精力充。他日破浪乘长风，宇宙任驰骋，好友好友莫等闲，一刻千金同。

歌词对同学们寄托着殷切的期望。

校歌的词曲都已忘记了。

这年，在花喜露的倡议并主持下，我们在过道墙上创办文艺校刊，用全裁图画纸选抄学生优秀作文，也有老师作品。他主编，我画刊头、插图。上学期的叫《春风》，下学期的叫《秋潮》，各出一期。自第二年起，每年出一本（32开本）校刊叫《飞浪》，也是他主编，我画封面，共出两期。这些刊物，在引导学生写作和爱好文艺上，起了一定作用。

在这一年，学校还曾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。他负责选拔学生作文和大、小楷（毛笔大楷和钢笔小楷），我负责指导学生画图画（铅笔、钢笔、墨笔及水彩）、做手工（纸、泥、秫秸等制品），我们夜以继日地忙。夜间，他每逢批阅到学生好的诗文时，就往往情不自禁地低吟或索性朗读起来。有时，还把学生找来，当面指点。有时，也看我们画画、做手工，他还曾画两幅四开纸的水彩画：一幅是“风雨满江城”——画面是在斜风细雨中，江边一城，房屋栉比，绿柳低垂；远处白帆点点，冒着风雨前行。另一幅是“长城春晓”——画面是一条人行长堤，沿堤是一排白杨，由近及远；堤内春水盈盈，堤外芳草萋萋；蔚兰天空，一抹朝霞，生趣盎然。这两幅画，展览过后，我爱不释手，妥为珍存。虽经时事更迭，辗转迁徙，未尝弃舍，却遭十年浩劫，连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